

执行协商对农户易地扶贫政策满意度的影响研究 ——以赣南原中央苏区为例

张广来¹ 廖文梅^{2*}

(1. 暨南大学 经济学院, 广州 510632;

2. 江西农业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农村土地资源利用与保护研究中心, 南昌 330045)

摘要 为了解移民政策的执行协商对农户满意度的影响,利用赣南原中央苏区433户易地扶贫搬迁农户的调研数据,以最后通牒博弈实验为理论分析基础,首先运用有序probit模型实证检验执行协商对农户易地扶贫搬迁政策满意度的影响,在考虑了二者间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后,通过选取工具变量运用双变量有序probit模型再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完善贫困地区的基层民主协商制度,扩大移民农户参与易地扶贫搬迁政策的执行协商力度,能够更加有效的实现政策扶贫目标,提升农户的政策满意度。最后,根据实证分析结果,总结了相关政策启示。

关键词 执行协商; 政策满意度; 易地扶贫搬迁; 最后通牒博弈实验; 赣南原中央苏区

中图分类号 F320.2 **文章编号** 1007-4333(2018)03-0185-11 **文献标志码** A

An empirical study of the influence of the execution and negotiation of the relocated migration policy to the farmers' satisfaction: A case study of former central soviet areas in Gannan

ZHANG Guanglai¹, LIAO Wenmei^{2*}

(1. College of Economics, Jina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2, China;

2. 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Research Center on Rural Land Resource Use and Protection, Jiangxi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Nanchang 330045, China)

Abstract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influence of immigration policy on farmer's policy satisfaction, survey data with 433 farmers of the relocated migration from former central soviet areas in Gannan in this study. Firstly, Probit model is adopted to analyze the data based on the Ultimatum Game. The possible endogenous problems between the execution and negotiation of the immigration policy and the farmers' policy satisfaction are considered in the analysis. Bioprobit model is then used to conduct an analysis by selecting appropriate instrumental variable. The results show that execution and negotiation of the immigration policy can significantly increase the farmers' policy satisfaction. Relevant policy implications are suggested based on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Keywords execution and negotiation; policy satisfaction; relocated migration; Ultimatum Game; former central soviet areas in Gannan

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使命。在精准扶贫和精准脱贫工作过程中,一条行之有效的重

要路径是通过实施由政府主导的公共政策帮助贫困地区农户改善生活环境,提高生活质量,生态移民政策即是其中的典型方式之一^[1]。

收稿日期: 2017-05-31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71463025); 江西现代农业及其优势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决策支持协同创新中心招标(委托)课题(XDNYA1512); 江西省杰出青年人才资助计划项目(2017BCB23043); 江西省百千万人才人选工程(境外研修计划项目)

第一作者: 张广来, 博士研究生, E-mail: zglai24@126.com

通讯作者: 廖文梅, 副教授, 主要从事农林经济理论与政策研究, E-mail: liaowenmei@126.com

在现有的中国公共政策的研究领域中,政策执行难、政策失效和政策满意度低下等问题已经成为学者们重点研究的内容。乡村治理工作的多变性与政策执行过程中的复杂性使得政策的实施已不再是简单的“一纸公文+强制执行”,农民阶层公平民主意识的加强和文化素质的提升使得他们参与政策协商制定的意愿愈加强烈^[2]。自“协商民主”的概念在1980年被首次提出之后,其内涵和参与方式均在不断地丰富发展^[3]。但在早期国外学者的认知中,一部分认为中国的政治性质是“威权性质”下限制了民众话语权的统治性质^[4],这会抑制公民参与政策的讨论并且无法保证公民公平地享有政治参与的权利^[5]。直至2008年,首次有国外学者意识到并提出中国农村的政策执行早已逐步开始了协商民主的步伐,并有学者论证了民众参与政策的执行协商有利于保证中国的政权稳定^[6]。但这一部分的文献仍然局限于讨论威权政治下的执行协商,并且多为定性的讨论与分析,缺乏实证上的经验研究和基层动态跟踪。

中国学者早期关于农民参与政策协商的研究多集中在农村公共品的供给领域^[7-8],而分析政策的执行协商与农户政策满意度评价关系的实证研究却不多,且基本为定性分析政策执行协商的作用^[9]。直至刘祥琪等^[10]利用调研数据实证分析征地过程中农民对于政策参与权的需求与其最终形成的政策满意度二者之间的关系,提出了“程序公正先于货币补偿”的观点,为后续学者开展执行协商与政策满意度关系的实证研究奠定了重要基础。

在分析执行协商与农户政策满意度二者间关系的研究中,有学者选择从绩效的角度予以考虑^[11],但其研究未真正量化政策的执行协商程度,并且没有实证分析政策的执行协商程度的大小究竟会对政策满意度产生多大的影响。而刘向南等^[12]从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这4个方面量化出征地政策实施过程中农户的权利参与和权利保障程度,并在控制其它个体特征等因素后实证分析权利保障与农民满意度之间的关系后,研究发现保障农民参与政策实施过程中的程序性权利,给予农户平等参与谈判的权利能够切实提高农户政策满意度。值得提出的是,刘向南的研究尚未考虑政策协商与农户政策满意度二者间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即对可能存在的遗漏变量和双向因果问题并未予以研究。吴比等^[13]对这一内生性问题做出了解决,他通过选

用双变量有序 probit 模型,并选取了适合的工具变量——“村干部实际人数”作为内生变量的工具变量,实证检验农村政策的执行协商对政策满意度的影响。吴比的研究为本研究的创作分析提供了重要的研究思路,但其研究主要是分析宏观层面的中国“三农政策”实施后农民的政策满意度情况,未将不同政策类别进行区分,研究结论的适用性有待提升。同时,本研究在解决内生性问题上做出了进一步的改进,这将在后文的分析中进行详细说明。

因此,本研究选择国家和省级扶贫开发重点县最为集中的区域之一的赣南原中央苏区作为研究区域,并选择在精准脱贫工作中起着重要影响作用的生态移民政策作为研究对象,根据实际调研中生态移民政策的实施情况,选择赣南原中央苏区内的宁都县、于都县、会昌县和上犹县4个县的433户易地扶贫搬迁农户为研究样本。通过运用有序 probit 模型和基于内生性问题处理的双变量有序 probit 模型,实证检验执行协商对移民农户政策满意度的影响,以期提升生态移民政策的协商治理水平和改善农户政策满意度提供可能的借鉴。

1 执行协商影响农户政策满意度的理论分析——“最后通牒博弈实验”

本研究旨在分析移民政策的执行协商对于农户政策满意度的影响,其中关注移民政策的执行协商可以反映为对政策执行过程中的“公平关注”,而政策满意度则是农户对于移民政策实施效果的真实反映,反映了农户对于移民政策的感知和期望价值。“公平关注”是政策执行过程中农户参与度的动机性驱动力,可理解为农户在自行比较自我收益和他人收益。基于这种自我收益和他人收益间的相互比较,传统的主流经济学关于“理性经济人”的假设可能就不再适用。因为在面对一项由政府主导实施的具有利民性质的移民政策时,农户可能会因为公平感等非理性因素的影响而改变其在政策实施过程中的参与选择行为^[10]。

近些年来,实验经济学家在考虑了这种由“公平关注”引起的“公平偏好”属性后,运用“最后通牒博弈”实验模拟人们的决策行为,发现决策过程中的公平参与对于人们决策行为的影响甚至高于决策实施结果^[14]。“最后通牒博弈”试验是于1982年由古斯教授等最早设计进行,试验的内容为将一笔固定的钱分给提议者A和响应者B,提议者A有权利对分

配方案 W 作出设定,而响应者 B 则有权选择接受方案或是拒绝方案。基本原则是仅当方案被通过时 A、B 双方才可以按照方案得到钱,若方案无法被响应者 B 通过,则所有钱都将上交,此时 A、B 收益均为 0。“最后通牒博弈”试验的结果是提议者 A 愿意分配给响应者 B 的平均金额为总金额的 37%,而响应者 B 对于给予其金额小于 20% 的分配方案有一半的可能性会选择拒绝此分配方案。该试验结果能够很直观的反映出在博弈过程中原本占据优势位置的提议者 A 若在分配方案设计过程中过于不公平时,此时的响应者 B 将不再符合“理性人假设”中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原则去接受提议者 A 的分配方案,而会选择拒绝提议者 A 提出的分配方案,最终导致的结果是提议者和响应者双方都无法获得任何收益。

而在实际生活中,占据优势地位的提议者一般会提出一个相对公正的分配方案^[15]。这是因为响应者多将“公平参与”视作一种公认的“社会准则”,公平感作为重要的心理因素可能比物质利益更能够影响响应者的决策。将这一理论应用到本研究分析研究上,可以假设移民政策的执行者为“最后通牒博弈”实验中的提议者 A,政策实施的执行协商程度可视为分配方案 W,易地扶贫搬迁农户可视为响应者 B。而政策满意度与农户的收益具有重要关联,且可假设为正向的作用关系。因此,“最后通牒博弈”被视为本研究开展进行的重要理论基础,基于此提出本研究的基本假设即:

H1: 移民政策的执行协商会正向影响农户的政策满意度。

2 计量模型、数据来源与指标选取

2.1 计量模型

研究测度的被解释变量为“易地扶贫搬迁农户对于移民政策的满意度评价”,研究中选择使用 1~5 的序数表达移民政策满意度从“非常不满意”至“非常满意”,被解释变量属于多分类有序变量,因此研究选择使用有序 probit 模型进行回归分析。研究中的被解释变量为易地扶贫搬迁政策的执行协商,同时还包括农户个体特征变量与移民政策执行时的外部环境特征变量等若干个控制变量。

此外,还有部分学者在分析有序离散型变量为被解释变量的相关问题时选择使用了有序 logit 模型方法进行估计分析,而 Ferreri-Carbonell 等^[16]研

究表明不论选择的是有序 probit 模型、有序 logit 模型或者普通 OLS 模型,最终得到的回归系数符号及其显著性均是相同的。因此为了验证 Ferreri-Carbonell 等的研究结论,同时便于结果的比较,本研究采用有序 probit 模型、有序 logit 模型和 OLS 模型进行同步回归,以分析各模型结果的差异和优劣。

2.2 数据来源

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以瑞金为中心的赣南、闽西和粤北广大区域建立的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简称。进入 21 世纪以后,赣南原中央苏区是国家和省级扶贫开发重点县最为集中的区域之一,属于集中连片的特别困难地区。2012 年 6 月 28 日国务院颁布《关于支持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振兴发展的若干意见》,启动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振兴发展重大国家战略。2016 年 2 月 1 日,国务院再次颁布《关于加大扶贫攻坚力度支持革命老区开发建设的指导意见》,要求以改变红色革命老区的发展现状为重点目标,进一步加大贫困区的扶持力度,对居住在生活条件恶劣地区的农户实施移民搬迁工程,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重点解决民生领域的疑难问题。

本研究数据来源于 2016 年课题组对赣南原中央苏区县中的宁都县、于都县、会昌县和上犹县等 4 个县的易地扶贫搬迁农户的入户调查。每个县发放 120 份问卷,共计 480 份问卷。调研方式为分层随机抽样,即每个县随机抽取 4 个乡镇,每个乡镇随机抽取 2 个村,每个村随机抽取 15 个农户,随机抽取的农户不在家的,采用偶遇方式进行补充,偶遇无法补充则放弃这一农户的调查。此次调查收回问卷 480 份,在数据整理过程中严格剔除缺失数据的问卷后,实际有效问卷为 433 个,有效率达到 90.2%。

2.3 指标选取

被解释变量:移民农户的政策满意度。本研究在问卷中设计了如下问题“总体而言,您对该移民政策(易地扶贫搬迁政策)实施效果的满意程度如何?”,要求被调查的农户在“非常不满意、较不满意、一般、较满意、非常满意”之间做出相应的选择。并按照满意程度由低到高分别赋值 1~5 的数值进行赋值。

核心解释变量:易地扶贫搬迁政策的执行协商指标。参照已有研究中对这一指标问题的量化设计^[12-13],问卷中对于量化“移民政策的执行协商”指

标的问题设计是“您对于移民政策在制定实施过程中征集询问农户意见的工作完成情况如何评价?”,要求被调查农户在“非常差、较差、一般、较好、非常好”之间做出相应的选择,并按照1~5的数值进行赋值。执行协商的本质反映了在政策制定和执行的过程中,政府执行部门是否做到充分保障农民参与政策实施过程中的程序性权利,以及是否给予农户平等参与谈判的权利。

其他控制变量:本研究选择的控制变量主要涵盖了农户的个体特征变量和反映农户所在村的经济环境特征的外部环境变量。同时研究中将所有433份调研农户所处的整体宏观环境视为一致的常数,也即所有4个县在同一时期所面临的整体环境均是对于赣南原中央苏区这一宏观整体而言。控制变量的具体设计从以下2个方面予以说明:

2.3.1 农户个体的微观层面特征变量

主要涵盖以下指标:1)户主性别。男女社会地位在农村地区还无法做到完全平等,因此有关政策在执行协商过程中往往会因为性别的差异而区别对待,因此有必要在控制变量中引入性别变量。2)户主年龄。年龄作为个体特征的重要变量之一,对于政策的执行协商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同时不同年龄段的农户对于政策满意度的评价标准也不同。3)户主文化程度。调研农户的户主文化程度能够影响农户参与政策执行协商的参与度和有效性,通常而言,文化程度越高的农户对于政策的理解能力越强,也更容易与政策执行者进行沟通交流。4)农户家庭中的依赖人口比例。家庭中的依赖人口比例指的是家庭中小于16岁和大于70岁人数占家庭总人口的比例,该项指标值的增大表明农户所承担的家庭负担更重,进而使得移民家庭对于政策实施后的期望值较高,因此会影响到农户最终的政策满意度。5)是否以农业为家庭经营主业。调研农户的家庭经营主业是否非农业也会对于农户的政策预期与政策满意度产生一定的影响,本研究未将不同经营主业进行分类,只是以“是否以农业为经营主业”进行二分类赋值。6)家庭年均总收入。政策制定执行的重要目标之一就是为改善农民生活,提高农民收入。因此,经济收入的变化对于农户的政策满意度评价起着重要的影响作用。

2.3.2 政策执行的外部环境变量

主要涵盖以下指标:1)所在村距离乡镇政府的距离。距离乡镇政府较近的村一般会在政策执行时

具有更快的反应速度和更好的执行力,因此会有更优越的政策执行条件。2)所在村的经济水平。该指标可以直观地为农户评价政策实施效果提供评价标准,若政策实施后所在村的经济水平比本县其他村高,其农户的政策满意度可能会更高。3)所在村的人均收入水平。该指标是农村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之一,对农户政策满意度会产生一定的影响。4)所在村的第一产业收入占村财政总收入的比重。该指标反映农业产业对于本村财政收入的贡献程度,贡献度越高的地区农业产业依赖性越强,受移民政策影响与改变可能更大,这也会造成农户政策满意度的变化。5)所在村的外出务工人员占村总人口的比例。该指标反映了农户所在村经济发展的人口基础,同时外出务工人员比例的变化也会对农户政策满意度评价产生改变。

具体各个变量的度量标准和描述性统计见表1所示。

3 实证结果分析

3.1 基本回归结果

表2汇报了移民政策的执行协商对于农户政策满意度的回归结果,其中第1列和第2列采用的方法是有序probit模型估计,同时第1列未控制政策执行的外部环境变量。为了与有序probit模型结果比较,在表2的第3列和第4列分别汇报采用OLS模型和有序Logit模型的估计结果。表3则是利用有序probit模型估计结果测算的各个自变量对于因变量农户政策满意度的边际效果。根据表2的第2列有序probit模型结果,移民政策的执行协商变量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正向影响着农户政策满意度,表示当执行易地扶贫搬迁政策时征求移民农户的意见可显著性地提升农户对于移民政策的满意度。而分析移民政策的执行协商对于农户政策满意度的边际概念影响后发现,移民政策的执行协商完成度越高,可使得农户政策满意度为“非常不满意”的概率下降0.2%;为“较不满意”的概率下降2.1%;为“一般”的概率下降4.3%;为“较满意”的概率上升4.2%;为“非常满意”的概率上升2.4%。该边际效果的结果反映出:农户参与移民政策的执行协商越高,其政策满意度正向提升的概率就越大。

农户个体特征的回归结果显示,移民农户的性别、文化程度和家庭依赖人口比例对于农户政策满意度具有显著地影响。反映在性别为女的调研农户

表1 变量定义和描述性统计

Table 1 The definition and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variables

变量 Variable	变量定义 Definition	最小值 Min	最大值 Max	均值 Mean
政策满意度 Policy satisfaction	按照农户的回答:非常不满意=1,较不满意=2,一般=3,较满意=4,非常满意=5	1	5	3.441
政策的执行协商 Execution and negotiation of policy	按照农户的移民政策参与度回答:非常差=1,较差=2,一般=3,较好=4,非常好=5	1	5	3.739
性别 Sex	男=1,女=2	1	2	1.379
年龄 Age	被调研农户的户主年龄	19	77	45.106
文化程度 Education level	文盲=1,小学=2,初中=3,高中=4,大专及以上=5	1	5	2.709
家庭依赖人口比例 Ratio of dependency population to family	家庭中年龄小于16周岁和大于70周岁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	0	1	0.322
是否以农业为家庭经营主业 Whether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is the family's dominant business	非农业为经营主业=0,农业为经营主业=1	0	1	0.711
家庭年总收入/元 Annual aggregate income of family	调研农户家庭年总收入:0~19 999=1;20 000~39 999=2;40 000~59 999=3;60 000~79 999=4;≥80 000=5	1	5	3.083
至乡镇政府的距离 The distance to township-level government	农户所在村距离乡镇政府距离的公里数	1	28	4.592
村经济发展程度 Economic development at village-level	调研农户所在村经济发展程度在其县所处的水平:下等=1,中下等=2,中等=3,中上等=4,上等=5	1	4	2.718
村民人均收入 Average income of villagers	调研农户所在村的村民人均收入值	3 180	8 500	5 544
村第一产业占财政收入比重 Ratio of primary industry to fiscal revenue of village	调研农户所在村的第一产业收入占村财政总收入的比重	0.25	0.85	0.573
村外出务工占总人口比例 Ratio of migrant workers to total population of village	调研农户所在村的外出务工人口占村总人口的比例	0.104	0.632	0.41

对于移民政策满意度评价更低。这可能是由于女性因长时间居住在农村地区,对于移民政策的参与感更强,导致其对政策的期望值可能会更高,因此,女性对政策满意度的评价会低于男性;户主文化程度的影响系数为负数,说明户主文化程度的提升使得农户对于移民政策满意度评价会降低,主要是因为文化程度高的户主对信息知识的掌握度更高,对于政策认知感也更强烈,所以文化程度越高的户主对于政策满意评价的标准也越高。因此移民政策在实

施过程中对于文化程度高的户主要更加注重交流和沟通;调研农户的家庭依赖人口比例的增加会显著地提升农户政策满意度。这是因为易地扶贫搬迁政策主要是为了改善贫困深山区的农户长期积贫积弱的现象而实施的利民政策,因此对于家庭中小孩和老人人口较多的农户家庭而言,参与易地扶贫搬迁政策会改善其长期较差的生活条件,有利于小孩成长环境和老人养老环境的改善,因此家庭依赖人口比例高的农户对于移民政策满意度评价更高。

表2 移民政策的执行协商与农户政策满意度的实证结果

Table 2 Empirical result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execution and negotiation of the immigration policy and the farmers' policy satisfaction

自变量 Independent variable	有序 Probit(1) Ordered Probit (1)	有序 Probit(2) Ordered Probit (2)	OLS(3) Ols (3)	有序 Logit(4) Ordered Logit (4)
政策的执行协商 Execution and negotiation of policy	0.159** (0.065)	0.166** (0.067)	0.116** (0.046)	0.289** (0.114)
性别 Sex	-0.203(0.133)	-0.253* (0.135)	-0.173* (0.094)	-0.502** (0.238)
年龄 Age	-0.005(0.005)	-0.002(0.005)	-0.001(0.004)	-0.005(0.01)
文化程度 Education level	-0.061(0.056)	-0.097* (0.057)	-0.068* (0.04)	-0.210** (0.102)
家庭依赖人口比例 Ratio of dependency population to family	0.505** (0.247)	0.697*** (0.258)	0.482*** (0.179)	1.205*** (0.449)
经营主业是否农业 Whether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is the family's dominant business	-0.105(0.12)	-0.107(0.125)	-0.077(0.087)	-0.161(0.218)
家庭年总收入 Annual aggregate income of family	-0.027(0.05)	-0.009(0.051)	-0.008(0.036)	0.012(0.089)
至乡镇政府的距离 The distance to township-level government	—	0.023*** (0.009)	0.016*** (0.006)	0.044*** (0.016)
村经济发展程度 Economic development at village-level	—	-0.182** (0.08)	-0.123** (0.055)	-0.364*** (0.14)
村民人均收入 Average income of villagers	—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村第一产业收入占比 Ratio of primary industry to fiscal revenue of village	—	0.004(0.002)	0.003(0.002)	0.008(0.004)
村外出务工人员占比 Ratio of migrant workers to total population of village	—	1.246** (0.471)	0.871** (0.328)	2.405*** (0.833)
Log likelihood	-500.47	-485.31	—	-483.17
Prob > chi2	0.035	0.000	—	0.000
Pseudo R ²	0.015	0.045	—	0.049
R ²	—	—	0.099	—
Adj R ²	—	—	0.074	—
样本数 Observations	433	433	433	433

注:***、**、* 分别表示在 1%、5% 和 10% 的统计显著水平上显著,回归系数对应的括号内为标准误。

Note: *** denotes significance at 1%, ** at 5%, and * at 10%. Standard errors are reported in the parenthesis.

表3 移民政策的执行协商对农户政策满意度影响的边际效果

Table 3 Marginal effects of the execution and negotiation of immigration policy on farmers' policy satisfaction

自变量 Independent variable	非常不满意 Very dissatisfied	较不满意 Relatively unsatisfied	一般 Normal	较满意 Relatively satisfied	非常满意 Very Satisfied
政策的执行协商 Execution and negotiation of policy	-0.002* (0.002)	-0.021** (0.009)	-0.043** (0.018)	0.042** (0.017)	0.024** (0.01)
性别 Sex	0.004(0.003)	0.031* (0.017)	0.065* (0.035)	-0.064* (0.034)	-0.036* (0.02)
年龄 Age	0.000(0.000)	0.000(0.001)	0.000(0.001)	-0.000(0.001)	0.000(0.001)
文化程度 Education level	0.001(0.001)	0.012* (0.007)	0.025* (0.015)	-0.024* (0.015)	-0.014* (0.008)
家庭依赖人口比例 Ratio of dependency population to family	-0.01* (0.007)	-0.086*** (0.034)	-0.179*** (0.068)	0.175*** (0.067)	0.010*** (0.038)
经营主业是否农业 Whether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is the family's dominant business	0.001(0.002)	0.013(0.015)	0.028(0.033)	-0.026(0.031)	-0.016(0.019)
家庭年总收入 Annual aggregate income of family	0.000(0.001)	0.001(0.006)	0.002(0.013)	-0.002(0.013)	-0.001(0.007)
至乡镇政府的距离 The distance to township- level government	0.000(0.000)	-0.003** (0.001)	-0.006** (0.002)	0.006*** (0.002)	0.003** (0.001)
村经济发展程度 Economic development at village-level	0.003(0.002)	0.022** (0.01)	0.047** (0.021)	0.046** (0.02)	-0.026** (0.011)
村民人均收入 Average income of villagers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村第一产业收入占比 Ratio of primary industry to fiscal revenue of village	0.000(0.000)	0.000(0.000)	-0.001(0.001)	0.001(0.001)	0.001(0.000)
村外出务工人员占比 Ratio of migrant workers to total population of village	-0.018(0.012)	-0.154** (0.061)	-0.319*** (0.124)	0.313*** (0.122)	0.178*** (0.069)

注：***、**、* 分别表示在 1%、5% 和 10% 的统计显著水平上显著，回归系数对应的括号内为标准误。

Note: *** denotes significance at 1%, ** at 5%, and * at 10%. Standard errors are reported in the parenthesis.

政策执行外部环境变量的回归结果显示,被调研农户所在村的经济发展程度对于农户政策满意度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即所在村的经济发展程度越高,农户对于移民政策的满意度评价越好;调研农户所在村至乡镇政府的距离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正向影响移民农户的政策满意度。因为距离乡镇政府距离越近的村对于政策反应速度更快,农户对于政策的认知度和参与度也会优于距离较远村的农户,使得对于政策期望值和满意标准会更高。因此移民政策在实施过程中更要注重加强与距离乡镇政府较近村的农户沟通交流,提升地区政策的执行协商程度才能有利于提升农户的政策满意度。除此之外,调研农户所在村外出务工人员占总人口比例也显著地正向影响移民农户的政策满意度。

3.2 移民政策的执行协商与农户政策满意度内生性问题的讨论

上述基本回归结果表明移民政策的执行协商有利于提升农户的政策满意度。但已有学者指出政策的执行协商与农户的政策满意度之间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13]:一是因为方程存在联立性偏误问题。即移民政策在具体的落实执行过程中,村干部等具体的移民政策执行人可能会偏向于选择征求询问政策满意度评价较高农户的意见,同时对于政策满意度评价较低农户的意见会置若罔闻,甚至在政策的执行协商过程中不愿意去征求这部分农户的意见,因此二者间存在着双向因果关系。二是调研农户数据的测量误差。因为不论是对移民政策的执行协商测量还是农户的政策满意度评价都属于主观自评量表方法,数据本身之间可能存在测量误差。三是遗漏了部分自变量。这些问题使得移民政策的执行协商与农户的政策满意度二者间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因此认为3.1中有序probit模型的回归结果为有偏性而非一致性的。

为了解决二者间存在的内生性问题,计量经济学中常用的方法是工具变量法,即寻找一个与因变量“移民农户的政策满意度”无关却又与内生自变量“移民政策的执行协商”相关的外生变量,同时还需与模型的随机扰动项无关。但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本研究中的被解释变量和关键解释变量均为离散数据,此时若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则无法有效解决模型中的内生性问题^[17]。针对该问题,学术界研究发现使用双变量有序probit模型可以有效解决模型中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均为离散变量时的

内生性问题^[18-19],因此本研究在合理选取工具变量的前提下,使用双变量有序probit模型解决移民政策的执行协商与农户政策满意度之间的内生性问题。

已有研究中吴比等^[13]研究使用了“村干部实际人数”作为政策执行协商的工具变量,认为“村干部的实数”是衡量村级行政能力和政策执行能力的重要指标,同时农户的政策满意度又不受村干部的实际人数控制,所以选取该外生变量作为政策执行协商的工具变量。但本研究认为,由于“村干部的实际人数”在调研农户的村级层面均为相同的指标,无法很好的反映每个调研农户的个体差别,在替代不同农户的政策执行协商参与度上不具有完整的代表性,且该指标受不同村的规模大小以及政策导向的影响较大。因此,本研究选择的工具变量是调研农户的“对村干部的信赖程度”。因为每一个被调研的农户“对村干部的信赖程度”有独立的判断,可以体现出调研农户的个体差异性,同时农户对于村干部信赖程度越高,在移民政策的制定执行过程中若有意见想法会更愿意主动进行协商交流,村干部在执行协商过程中工作开展也更加流畅。而“对村干部的信赖程度”并不会影响农户的政策满意度,这是因为农户对于政策满意度的评价工作主要是受政策实施后其生活状况的改善结果影响,或许“对村干部的信赖程度”越高的农户一旦发现政策实施效果未达到其预期标准,可能政策满意度会更低于“对村干部信赖程度”低的农户。因此我们认为该指标是外生的,符合工具变量的相关要求。本研究对该指标的设计为“对村干部的信赖程度”由“非常低”、“较低”、“一般”、“较高”、“非常高”分别赋值1~5进行表达。

表4汇报了双变量有序probit模型的检验结果,内生性检验辅助参数 $athp$ 的估计系数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拒绝了移民政策的执行协商为外生变量的原假设,说明该指标是内生变量。从表4的检验结果可知,“对村干部的信赖程度”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正向影响着移民政策的执行协商,与前文的假设分析相一致。同时,在引入“对村干部的信赖程度”作为“移民政策的执行协商”的工具变量后,“移民政策的执行协商”变量依然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正向影响着农户的政策满意度,但其估计系数由原来0.170上升至0.229。除此之外,其他控制变量的显著性和回归系数符号均未发

生变化,仅在估计系数上有细微变动。因此,在控制了移民政策的执行协商与农户的政策满意度二者间

内生性问题后,依然可以得出结论:移民政策的执行协商显著地正向影响农户的政策满意度。

表 4 移民政策的执行协商与农户的政策满意度:双变量有序 probit 模型结果

Table 4 Regression results of the bioprobit model

解释变量 Explanatory variable	工具变量:对村干部的信赖程度 Tool variable:Extent of reliance to village cadres	
	政策满意度 Policy satisfaction	政策的执行协商 Execution and negotiation of policy
政策的执行协商 Execution and negotiation of policy	0.229** (0.103)	—
农户个体的微观层面变量 Individual micro variables	已控制	未控制
政策执行的外部环境变量 External environment variables	已控制	未控制
对村干部的信赖程度 Extent of reliance to village cadres	—	0.840*** (0.112)
<i>athρ</i>		0.107* (0.063)
Wald 检验 Wald Test		
chi ² (1)		2.940
Prob>chi ²		0.087
样本数 Observations		433

注:***、**、* 分别表示在 1%、5%和 10%的统计显著水平上显著,回归系数对应的括号内为标准误。

Note:*** denotes significance at 1%, ** at 5%, and * at 10%. Standard errors are reported in the parenthesis.

3.3 稳健性检验

为保证研究结论的可靠性,本研究采用的稳健性检验方法是将调研的易地扶贫搬迁农户按照 4 个不同样本县进行分组回归,并对每个县分别计算有序 probit 模型的回归结果和引入工具变量后的双变量有序 probit 模型的回归结果,以检验解释变量的显著性和回归系数符号是否会发生改变。表 5 汇报了稳健性检验的结果,在使用有序 probit 模型进行各个县的分样本估计时,宁都县、于都县和会昌县的移民政策执行协商指标均显著地正向影响农户的政策满意度,只有上犹县的回归结果不显著。而在使用双变量有序 probit 模型进行各个县的分样本估计时,宁都县和会昌县的样本农户通过了内生性检验并且回归结果是依旧是移民政策执行协商指标均显著地正向影响农户的政策满意度。由上述检验结果表明,不论是分样本估计还是使用不同模型方

法进行估计,回归结果基本与上文一致,均反映出移民政策的执行协商能够显著性地正向提升农户的政策满意度,说明本研究结论较为稳健。

4 总结与启示

本研究首先运用有序 probit 模型回归估计移民政策的执行协商与农户的政策满意度之间的关系,之后在考虑了二者间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后,通过选择“对村干部的信赖程度”作为工具变量,运用双变量有序 probit 模型进行回归估计。研究表明,移民政策的执行协商能够显著地正向影响农户的政策满意度,且研究结论通过了稳健性检验。研究结果发现,完善贫困地区的基层民主协商制度,扩大移民农户参与易地扶贫搬迁政策的执行协商力度,能够更加有效地实现政策扶贫目标,缓解或者消除政策在执行过程中的农村基层矛盾突出等问题,

表5 稳健性检验结果

Table 5 The results of robustness test

解释变量 Explanatory variable	宁都县 Ningdu County		于都县 Yudu County		会昌县 Huichang County		上犹县 Shangyou County	
	Odered Probit	Bioprobit	Odered Probit	Bioprobit	Odered Probit	Bioprobit	Odered Probit	Bioprobit
	政策的执行协商 and negotiation of policy	0.192*	0.062	0.204*	0.209*	0.350**	0.472***	-0.05
农户个体的微观层面变量 Individual micro variables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政策执行的外部环境变量 External environment variables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ath\rho$	—	0.384*** (0.143)	—	0.147 (0.128)	—	0.141* (0.129)	—	-0.101 (0.142)
Pseudo R^2	0.127	—	0.161	—	0.101	—	0.164	—
样本数 Observations	112		109		108		104	

注:***、**、* 分别表示在 1%、5% 和 10% 的统计显著水平上显著,回归系数对应的括号内为标准误。

Note: *** denotes significance at 1%, ** at 5%, and * at 10%. Standard errors are reported in the parenthesis.

提升农户的政策满意度。因此,需要加强移民政策的宣传力度,提升农户对移民政策的认知度。同时还要加强行政和司法监督,提升移民政策执行协商的有效性。提升政府工作效率,树立良好的干部形象,增强农民对于干部的信任度才能切实帮助移民农户在政策执行时更好的与执行干部进行沟通交流,表达自身的真实诉求。

此外,在考虑了其它影响农户政策满意度的控制变量后,研究发现若要切实提升移民农户的政策满意度,政府应大力发展乡村经济,加快移民落户村的经济增长速度,提升农民生活的外部环境质量。对于家庭依赖人口比例高的农户应优先重点地解决其对于扶贫搬迁的迫切需求。同时,尽管户主的文化程度与政策满意度是负向作用的关系,我们仍然应当大力倡导提升农民的受教育程度,提高农户的文化知识水平。农民的文化程度提高后对于政策满意度评价标准的提升从侧面而言也是执政者提升执政能力的“好机遇”,只有政策制定者和执行者能够真正妥善应对农民对于移民政策的高标准和严要求,才能更好地保证移民扶贫工作的实施效果,提升农户的政策满意度,尽早实现贫困地区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终极目标。

参考文献 References

- [1] 胡业翠,武淑芳,王静. 基于参与式调查的广西生态移民迁入区农户收入效应评价[J]. 农业工程学报, 2016(21):264-270
Hu Y C, Wu S F, Wang J. Evaluation of farmers' income effect in immigration regions of ecological resettlement project in Guangxi Province[J]. *Transactions of the Chinese Society of Agricultural Engineering*, 2016(21):264-270 (in Chinese)
- [2] 韩万渠. 基层官员的身份困境与乡村治理中的政策执行变异[J]. 中国行政管理, 2016(9):100-106
Han W Q. Identity dilemma of street-level bureaucrats and policy implementation variation in rural governance[J]. *Chinese Public Administration*, 2016(9):100-106 (in Chinese)
- [3] Dalton R J, Shin D C, Jou W. Understanding democracy: Data from unlikely places[J]. *Journal of Democracy*, 2007, 18(4): 142-156
- [4] Levitsky S, Way L. The rise of competitive authoritarianism [J]. *Journal of Democracy*, 2002, 13(2): 51-65
- [5] Hollyer J R, Rosendorff B P, Vreeland J R. Democracy and transparency[J].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2011, 73(4): 1191-1205
- [6] He B, Warren M E. Authoritarian deliberation: The deliberative turn in Chinese political development [J]. *Perspectives on Politics*, 2011, 9(2): 269-289
- [7] 张晓波,樊胜根,张林秀,黄季焜. 中国农村基层治理与公共物品提供[J]. 经济学(季刊), 2003(3): 947-960

- Zhang X B, Fan S G, Zhang L X, Huang J K. Local Governance and Public Goods Provision in Rural China[J]. *China Economic Quarterly*, 2003(3): 947-960 (in Chinese)
- [8] 蔡晓莉, 刘丽. 中国乡村公共品的提供: 连带团体的作用[J].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2006(2): 104-112
Cai X L, Liu L. The provision of China's rural public goods: The role of the joint group[J]. *Comparative Economic & Social Systems*, 2006(2): 104-112 (in Chinese)
- [9] 徐汉明, 杨择郡. 推进土地股份合作制实施中的民意考量[J]. *管理世界*, 2012(5): 176-177
Xu H M, Yang Z J. Promoting the public opinion of the land joint-stock cooperative system[J]. *Management World*, 2012(5): 176-177 (in Chinese)
- [10] 刘祥琪, 陈钊, 赵阳. 程序公正先于货币补偿: 农民征地满意度的决定[J]. *管理世界*, 2012(2): 44-51
Liu X Q, Chen Z, Zhao Y. The procedural fairness prior to the monetary compensation: The determinants of the degree of farmers' satisfaction at levying their land[J]. *Management World*, 2012(2): 44-51 (in Chinese)
- [11] 李锐, 黄金鹏, 赵曼. 市场“效率”与政府“公平”的协同: 基于积极劳动力市场项目第三方评估机制研究[J]. *财贸经济*, 2015(3): 150-161
Li R, Huang J P, Zhao M. Synergy between market and government: A third-party evaluation of active labor markets programs[J]. *Finance & Trade Economics*, 2015(3): 150-161 (in Chinese)
- [12] 刘向南, 吕图, 严思齐. 征地过程中程序性权利保障与农民满意度研究: 基于辽宁省6市30村的调研[J]. *中国土地科学*, 2016(5): 21-28
Liu X N, Lv T, Yan S Q. Study on the procedural rights guarantee and farmers' satisfaction in the process of land acquisition: Based on the investigation of 30 villages, 6 cities in Liaoning Province[J]. *China Land Sciences*, 2016(5): 21-28 (in Chinese)
- [13] 吴比, Li Z M, 杨汝岱, 彭超. 农村政策执行协商会影响农民的政策满意度吗? [J]. *中国农村经济*, 2016(4): 55-69.
Wu B, Li Z M, Yang R D, Peng C. Do the consultation and execution of rural policy influence farmers' satisfaction? [J]. *Chinese Rural Economy*, 2016(4): 55-69 (in Chinese)
- [14] 王益文, 张振, 张蔚, 黄亮, 郭丰波, 原胜. 群体身份调节最后通牒博弈的公平关注[J]. *心理学报*, 2014(12): 1850-1859.
Wang Y W, Zhang Z, Zhang W, Huang L, Guo F B, Yuan S. Group Membership Modulates The Recipient's Fairness Consideration in Ultimatum Game [J]. *Acta Psychologica Sinica*, 2014(12): 1850-1859 (in Chinese)
- [15] Binmore K, McCarthy J, Ponti G, Samuelson L, Shaked A. A backward induction experiment [J]. *Journal of Economic Theory*, 2002(104): 48-88
- [16] Ferreri Carbonell A, Frijters P. How important is methodology for the estimates of the determinants of happiness [J]. *Economic Journal*, 2004, 114(497): 641-659
- [17] Angrist J D. Estimation of limited dependent variable models with dummy endogenous regressors[J]. *Journal of Business & Economic Statistics*, 2001, 19(1): 2-28
- [18] Sajaia Z. Maximum likelihood estimation of a bivariate ordered Probit Model: Implementation and Monte Carlo Simulations [J]. *The Stata Journal*, 2009(2): 1-18
- [19] Russo G. Job and life satisfaction among part-time and full-time workers: The “identity” approach[J]. *Review of Social Economy*, 2012, 70(3): 315-343

责任编辑: 王岩